

从“抵斗还官”到“量取息米”： 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利息策略的演变与道义困局

杨乙丹 乔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 / 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赈贷是与赈粟和赈给平行的救荒举措,旨在满足灾民或贫民借贷口粮、种子、牛具的基本需求。在实施赈贷之际,被救助者的贫困社会属性和救荒的道义正当性,内在地要求官府采取“秋成抵斗还官”措施,不收取放贷利息。但救荒资源的经常性短缺、备荒仓储难以持续运转和日常化赈灾造成的财政压力,倒逼着“量取息米”政策的出台。而收取利息的赈贷行为,又违背了该项制度的设计初衷。从“抵斗还官”和“量取息米”的策略演变,折射出古代灾荒赈贷制度运行的内在道义困局。

【关键词】赈贷;利息政策;道义限制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6-0050-11

From Returning the Official after the Autumn Harvest to Taking an Interest Policy: The Evolution and Moral Predicament of Famine Relief Interest Strategies in Ancient China

YANG Yi-dan QIAO Qin

(Institut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A&F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Heritage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Yangling 712100)

Abstract: Loan relief is a famine relief measure aiming to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disaster victims or the poor in borrowing rations, seeds, and catt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an relief, the poor social attributes of the rescued and the moral legitimacy of famine relief internally require the adoption of measures of "returning the official after the autumn harvest" and do not charge loan interest. However, the frequent shortage of resources for famine relief, the difficulty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famine-prepared warehouses, and the financial pressure caused by daily disaster relief have forced to introduce the "taking an interest" policy. However, charging interest on relief loans violated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system. Th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es reflected the internal moral dilemma of the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loan relief; interest policy; moral restriction

中国古代的救荒主要包括三个平行的措施:赈给、赈粟和赈贷。与无偿的赈给和平价售粮的赈粟相

[收稿日期] 2021-0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研究”(17XZS035);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凤岗卓越社科人才”(FGZY202002)

[作者简介] 杨乙丹(1980—),男,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灾害史;乔沁(1996—),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比^①,赈贷是通过发放救助性放贷,满足灾民或贫民的借贷需求,救助对象通常是乡村中有一定生产能力但缺乏口粮、种子、牛具的中层或中下层民户。

在赈贷救荒的早期实践中,通常是按“秋成抵斗还官”的方式,要求借贷者如数偿还,不加收利息,如果借贷者无力偿还,官府通常会通过蠲贷免除债务。对此,古代荒政学家曾以“非责以必偿”^②,概括了赈贷在利息和债务关系方面的独特运行规则。但自从青苗法以后,是否收取利息逐渐成为赈贷的新命题。于是,饥荒年景中的救助性放贷,就在“秋成抵斗还官”和“量取息米”的徘徊中艰难前行。本文在长时段考察的基础上,剖析古代赈贷利息政策的演变及其实施困局,试图为破解中国历史上的农贷制度这个“迄今尚未破解的谜团”^③做一些努力。

一、着眼于救荒而非取息盈利的赈贷传统

国家经营的商业性信贷和政策性信贷,在西周时期已经分野。《周礼》记载,西周时期设置“泉府”曾负责向民众发放货币性赊贷业务,“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④。尽管泉府的放贷利息率并不明确,但征收利息则是确定的,它在性质上属于国营商业性信贷。

除泉府之外,西周还设置了规模与之相当的“旅师”。旅师负责“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根据郑玄注,“以质剂致民”意指“所聚之粟,迁拟凶年振恤所输入之人……会计多少以贷之”^⑤。旅师放贷之际遵循“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的原则,放贷对象是青黄不接之际缺乏口粮和种籽的乡村贫民。这种借贷按照“秋则计其所贷而敛之”的原则偿还,不收取任何利息。对此,贾公彦明确指出:“直给不生利也。官得旧易新,民得济其困乏,官民俱益之也。”^⑥因此,“秋成抵斗还官”从一开始就是赈贷的重要特征。

其实,在旅师对乡村困乏之人“春颁而秋敛”之前,赈贷事实上已经出现。因为在周克商以前,周文王曾实施了“农假贷”政策,将粟米借贷给从事农业生产的贫民,解决他们缺乏口粮和种籽的问题。《逸周书·文酌解》载,周文王经常思量的九件大事,就包括“发滞以正民”和“贷官以属”。陈逢衡曰:“发滞以正民,救荒也。贷官以属,分任也。”^⑦可见,它们属于典型的救荒赈贷措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争霸和兼并战争的不断推进,小农业生产者的负担沉重,不得不借高利贷度日。不过,出于争夺权力和维护统治,一些诸侯国的“肉食者”采取了向农民进行救助性放贷的措施,如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宋国发生大饥荒,贤士子罕请宋平公“出公粟以贷”,并且“贷而不书”,不要求偿还,取得“宋无饥人”的救荒效果^⑧。不过,这类赈贷行为具有偶然性、随机性,不具有制度上的连续性。

相比于“肉食者”碎片化的赈贷行为,一些诸侯国试图通过赋予特定官僚机构放贷职能,缓解灾民或

① 对赈给、赈粟和赈贷的比较在荒政史研究中尚处空白。李华瑞先生曾在《宋代救荒中的赈济、赈贷与赈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一文中,对宋代的救荒中的赈济、赈贷与赈粟进行过较为系统的分析,但三者的运行范围与边界、功能面向、内在规定、历史演化等,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② [明]周孔教撰,夏明方、黄玉琴点校:《荒政议·荒政议总纲》,清宣统三年文盛书局石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8页。

③ 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金融研究》,2005年第2期。

④ [汉]郑玄、[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第15《泉府》,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4—405页。

⑤ [汉]郑玄、[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16《旅师》,第404—405页。

⑥ [汉]郑玄、[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16《旅师》,第405页。

⑦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一《文酌解第四》,第59页。

⑧ 杨柏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7页。

贫民的借贷困难,以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包山楚简》曾记载楚怀王六年(前313)前后,楚国通过“資金余种”的方式,为青黄不接之际缺乏种子的农民放贷种子^①。另外,睡虎地秦简反映了秦国的官仓、司空、县府等,负责向农民放贷麦种、铁农具、耕牛等,如果借贷者未能按期偿还,“令其官啬夫及吏主者代赏(偿)之”^②。但无论是包山楚简还是睡虎地秦简,均未有收取利息的信息。

秦代以降,着眼于救荒而非取息盈利的赈贷不断得以实施,成为巩固统治基础、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小农经济的重要支撑。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郑里廩簿》,记录了汉文帝时期官府在乡里放贷的信息^③,尽管简牍遗失了一些信息,但通过推断可以发现,当时郑里的仓廩借给农户种子的标准是每亩地一斗,且不收取利息。另外,始元二年(前85)三月,汉昭帝“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④。永元十五年(103)二月,汉和帝命“出廩贷郡国被灾贫民各有差”^⑤。官府虽要求偿还这些赈贷,但均未索要利息。

在被称之为“无月不战”的魏晋南北朝,饥荒年景中的赈贷传统仍得以延续。赤乌十三年(250)八月,丹杨、句容、故鄣、宁国等地因洪灾而导致大规模饥荒,大批农户缺乏粮种,孙权诏令免除农户债务并“给贷种食”^⑥。元康五年(295),荆、扬、兖、豫、青、徐等六州发生水灾,晋惠帝下诏“遣御史巡行振贷”^⑦。这些赈贷均遵循着“秋成抵斗还官”的规则,即使借贷者无力偿还,各王朝通常也会通过蠲贷政策免除债务,体现了赈贷在债务关系方面的软约束。

二、国家信贷的双轨运行及其对“抵斗还官”的冲击

隋唐时期,救荒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专门用以备荒救灾的义仓和常平仓网络得以铺设,打破了官仓赈灾的单一模式。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常平仓设置在州县以上的城市,主要承担平抑粮价和向城市灾民或贫民进行赈赈的功能。相比之下,义仓设置在里社或诸州县,“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⑧,以赈给或赈贷的方式救助乡里贫民或灾民。

义仓的赈贷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秋成抵斗而偿”的原则。贞观二十一年(647)秋,建州和泉州发生蝗灾,唐太宗诏令“开义仓赈贷”,并无要求征收利息。开元二十年(732)二月,因“贫下之人农桑之际多缺粮种”,唐玄宗下令诸县审责,“贫户应粮及种子,据其口粮贷义仓”,并明确规定“至秋熟后照数征纳”^⑨。

除义仓之外,诸色官仓也兼具灾荒赈贷的功能,尤其是未设义仓或义仓储备不足的州县,赈贷更仰赖于官仓。永徽二年(651)正月,唐高宗敕令遭受虫灾和水灾严重的州县,开正仓和义仓赈贷贫乏者^⑩。开元十五年(727),河南、河北诸州遭受水灾,唐帝国组织了大规模的赈贷,考虑到灾民无力及时偿还,唐玄宗下令对借贷官粮、麦种和谷子的灾民“候丰年以渐征纳”^⑪。

不过,唐代“秋成抵斗还官”的赈贷模式通常只适用于大灾后的恢复阶段,贫民日常化借贷官粮仍会收取一定的利息。阿斯塔那35号墓出土高昌县文书记载:“崇化乡里正史玄政纳麟德元年(664)官贷小

①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4-25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60页。

③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④ [汉]荀悦:《前汉纪》卷16《前汉孝昭皇帝纪》,民国四部丛刊初编,第436页。

⑤ [汉]袁宏:《后汉纪》卷14《后汉孝和皇帝纪》,民国四部丛刊初编,第483页。

⑥ [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7《吴主权》,中华书局,2000年,第848页。

⑦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4《惠帝纪》,中华书局,2000年,第59页。

⑧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51《食货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883页。

⑨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第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1260页。

⑩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2000年,第47页。

⑪ 《全唐文》卷29《缓通赋诏》,中华书局,1983年,第333页。

子貳斗,其年十二月叁拾日。”^①文书中的“官贷小子”指的就是借贷官仓所支付的利息。而通过官营放贷业而谋取财利虽不是唐帝国首创,但其却是“第一个大量运用放贷法筹措财源的政权”^②。贫民借贷官粮之所以会收取利息,是唐王朝推行商业性信贷和政策性信贷的双轨体制的必然结果。

唐代常平仓设置的初衷虽然是以赈灾的方式救助城市灾民或贫民,但为了规范各州常平仓的运行,开元七年(719)六月确定了“每籾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③的原则,承认了常平仓可以通过籾米的价格差获取一定的盈利。随后,唐玄宗敕令各州“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④,使得常平仓至少能获得三钱的法定盈利。安史之乱后,在恢复备荒仓储的过程中,常平仓和义仓的职能逐渐趋同,并以“常平义仓”的称谓见于史册。在此过程中,常平仓的盈利取向也在放贷过程中得以保留。唐广德年间交河县民举借常平仓粮的五个牒文中,第一件到第四件分别为“依官数收纳”“官征收本利”“依官法征(利)”和“依官生利”,第五件牒文则明确了常平仓放贷利息:“上件粟,至十月加叁分纳利者。”^⑤这些地方文书一再印证了唐代中期以后,专门备荒仓储的放贷并非都是“秋成抵斗还官”,“量取息米”已经变得较为普遍。

隋唐时期备荒仓储“量取息米”的政策取向,与当时推行的“公廩本钱”具有内在关联。早在开皇年间,隋文帝就曾借鉴北朝官府将公款贷放市肆而取利的经验,下令“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廩本钱,回易生利以给公用”^⑥。但在国家权力保障和强制推行下,公廩本钱很快偏离了“托本求利,以绳富家”^⑦的制度理念,日益高利贷化,贷放对象也逐渐下移至广大贫困的小工商业者和小农家庭。至唐高宗后期,“州县典史捉公廩本钱者,收利十之七”^⑧,与人们鄙夷的高利贷“信息”几无二致。

隋唐时期发达的官营商业性信贷对“抵斗还官”的传统赈贷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尤其是开元年间义仓和常平仓“加价折纳”的盈利导向改革,使得开仓赈灾越来越倾向于计算直接的利益回报,并推动着唐帝国在向灾民或贫民放贷时,不断将政策性救助转化为商业化取息盈利。

三、两宋时期赈贷救荒制度的结构性演变

(一)违背赈贷制度道义而规定的青苗法

赵宋以降,赈贷就成为经常性的救荒举措。建隆元年(960)正月,宋太祖曾命使者前往诸州负责赈贷事宜^⑨。鉴于战乱期间备荒仓储被废,建隆四年(963)三月,宋太祖诏令诸州在所属各县分设义仓,“人户欲借义仓粟充种食,委本县具灾伤人户申州,州即处分,计口赈贷”^⑩。通过官仓或义仓赈贷通常不收利息,而是要求按照“秋成抵斗还官”的方式偿还。乾德三年(965)三月,宋太祖在一份诏令中要求,开义仓和官廩赈贷,“仍令及时止依元数送纳”^⑪。开宝四年(971)二月平定刘鋹后,下令对广南管内州县乡村

① 国家文物局古物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88页。

② 罗彤华:《唐朝官方放贷机构试论》,《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7年12月,第38期。

③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502《邦计部·平籾常平》,第6021页。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9《食货下》,中华书局,2000年,第1432页。

⑤ 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页。

⑥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465页。

⑦ 《全唐文》卷304《议州县官月料钱状》,中华书局,1983年,第3088页。

⑧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55《食货志五》,中华书局,2000年,第918页。

⑨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十一月癸未,中华书局,2012年,第56页。

⑩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三《义仓》,中华书局,2014年,第5727页。

⑪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三《义仓》,第5729页。

中缺乏粮食者，“于省仓内量行赈贷，候丰稔日，令只纳元数”^①。

在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以前，赈贷并非都不收利息。庆历八年（1048）正月，梓州路转运使傅永徙至陕西关中，“至境，问民所乏，贷以种粮钱，令麦熟纳偿，而薄取其息，民大悦”^②。李参任陕西转运使时，曾因“部多戍兵，苦食少”，先借钱给粮食不足的民户，“俟谷熟还之官”^③，偿还时也收取一定的利息。不过，这种收取薄息的赈贷只是地方官员救荒的权宜之计，而非普遍施行的国策。

熙宁二年（1069）九月青苗法得以颁布实施。青苗法的出台是多重困境下的历史必然，一方面，北宋中期的“三冗”“两积”引发了严重社会经济危机，国家财政压力日益沉重。庆历以后，国家财政常年亏空数额达300万缗左右^④，至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经费短缺更是高达1570余万缗^⑤。另一方面，围绕常平仓和广惠仓构建的荒政体制运行效率低下，常平仓所储钱粮常被挪作他用，以至于“天下常平仓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⑥。并且，着眼于备荒赈灾的和籴政策，不仅掏空了常平仓，也为不良官吏和豪强地主大肆敛财提供了便利。对此，吕惠卿曾无奈指出：“今常平仓元价甚贵，经十余年乃一籴，或腐朽以害主吏，或价贵，人不能籴。”^⑦在此背景下，灾荒年景中的赈贷责任更多地转移到了官仓。但官仓作为国家一般性财政机构，又不得不遵循着既定的支出次序，即首先满足冗官、冗兵乃至冗费之需，然后才能顾及备荒赈灾，导致“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⑧的问题普遍。在诸多困境中，王安石以周代泉府“以国服为之息”为理论依据，充分吸收唐朝“公廩本钱”等的成功经验，最终推出了青苗法。

青苗法是一种“半市场、半道义”的信用机制，它既着眼于对贫困民户的救助，也着眼于现实压力的减缓和财政收入的增加，这个二重目标实现的核心途径就在于“使出息二分”的利率机制。关于青苗钱放贷收取二分利息，王安石近乎固执地争辩道：“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有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通、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之息，可乎？”^⑨

客观而言，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的过程中，还是尽量兼顾道义收益和短期经济收益的统一，努力使青苗法与传统农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在解释推行青苗新政的缘由时，王安石坦言，“昔之贫者举息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⑩。北宋士人魏泰曾曰：“王荆公当国，始建常平钱之议，以谓百姓当五谷青黄未接之时，势多窘迫。贷钱于兼并之家，必有倍蓰之息。官于是结甲请钱，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济贫民而抑兼并之道。”^⑪就连反对派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朝廷从初散青苗钱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债取利，侵渔细民，故设此法，抑其豪夺，官借贷，薄收其利”^⑫。

但灾荒赈贷毕竟不是商业性信贷，它需要遵循不以取息盈利为目的的运行原则。青苗法的“救民乏”“抑兼并”功能只是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如何最大程度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不是济困助贫^⑬，才是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七《赈贷上·赈恤灾伤》，第5811页。

②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2，皇祐四年二月庚辰，第4131页。

③ [元]脱脱：《宋史》卷330《李参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8512页。

④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国计出纳事》，文渊阁四库全书钞本，第856页。

⑤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二·历代国用》，中华书局，2011年，第700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7，嘉祐七年十月乙未，第4738页。

⑦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青苗》，第6043页。

⑧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青苗》，第6041页。

⑨ [宋]王安石：《临川文集》第73卷《答曾公立书》，文渊阁四库全书钞本，第2365页。

⑩ [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41《上五事劄子》，第1206页。

⑪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4，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44页。

⑫ [宋]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29《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6页。

⑬ 傅允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王安石青苗法与免役法再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青苗法追求的根本所在。以元丰六年(1083)为例,当年青苗钱盈利2927687贯石匹两,接近治平年间年赋收入的四分之一^①。并且,为了迎合朝廷以青苗钱的敛散规模评定奖罚的考核要求,各级官吏在依散青苗钱时往往违反自愿请贷原则施行强制抑配。在青苗钱敛散过程中,收取利息又为各环节的营私舞弊提供了机会,致使借贷民户的实际利息负担远远超过规定的二分之息。为此,时人晁说之发出“名则二分之息,而实有八分之息”^②的感叹,王岩叟等人也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青苗法“放债取利,与民争锥刀之末,以富国强兵者”^③的本质。

在汹汹的道义责难下,元祐元年(1086)正月,宋哲宗下令州县以常平斛斗量行赈贷乡村民户时,务必“令还纳所贷元数,更不取利息”^④,从而否定了青苗法放贷取息的做法,也再次明确了国家在组织灾荒赈贷之际,需要遵循“秋成抵斗还官”这一内在运行规则。

(二)朱子社仓“量取息米”理念的设计及其合理性

社仓是继常平仓之后,我国备荒救灾制度的又一创举。社仓的制度渊源可追溯至隋代的义仓,但通常意义上的社仓始于绍兴二十年(1150)魏掞之在建宁县长滩铺“依古社仓法,请官米以贷民”的努力,《宋史》因而称“诸乡社仓自掞之始”^⑤。不过,社仓在全国的颁行更应归功于朱熹^⑥。乾道四年(1168)春夏之交,建宁府崇安县大饥,朱熹等人出面向官府借常平米六百石,在乡村组织赈贷。由于赈灾效果显著,朱熹于乾道七年(1171)获得建宁府六万钱的资助,随后“得籍坂黄氏废地”而修建社仓^⑦。经过十余年的运行,社仓获得了“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的救荒效果。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浙东大饥,负责救灾事宜的朱熹上疏宋孝宗,劝请推行社仓法。随后,宋孝宗令“下朱熹社仓法于诸路”^⑧,社仓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设置。

社仓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备荒救灾机制,它是在虚弱的国家备荒赈灾能力和严峻的凶荒局势的结构性矛盾下,开明官绅为乡里穷乏之人开辟的立命之道。一方面,宋室南渡后为了妥善安置大批归业户、流民、归正民和军户,不得不将有限的备荒资源用于这些特殊人群所需要的种子、耕牛、农具等。于是,赈贷由主要解决灾民和饥民借贷口粮和种子,转变为主要解决回归业民等所需的农本问题。当国家有限的备荒赈灾资源大部分用到安置特殊社会群体,也就意味着普通民户在灾荒年景中,很难得到有效的救助性信贷支持。

另一方面,常平司承担着国家备荒救灾、赈贷灾民和流民的主要责任,但受战乱的时局影响,常平仓和义仓体系遭受重创,难以有效满足规模巨大的赈济所需,而本来用以备荒救荒的财政储备又多被侵移它用。绍兴初年任殿中侍御史的王缙曾言:“近年以来,常平中罢,而义仓之法亦名存实亡。官司借充支遣,例皆不即拨还。其有支移、折变去处,更不收纳,一有水旱,饥民流移,官司何以赈给?”^⑨右谏议大夫赵霈也曾无奈地指出:“诸路固尝许借常平、义仓米,又常令州县赈糴,艰难之际,兵食方阙,州县往往逐急移用,无可赈给。”^⑩尽管绍兴后期,宋廷一再强化对常平和义仓的治理,但面对严峻的救荒形势,常平

① 季平:《论司马光反对青苗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② [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库丛刊续编景旧钞本,第39页。

③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10《哲宗皇帝·青苗》,宛委别藏景钞本,第3644页。

④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丁巳,第8734页。

⑤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59《隐逸下·魏掞之》,第10445页。

⑥ 许秀文:《浅议南宋社仓制度》,《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

⑦ [宋]朱熹:《晦庵集》卷77《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文渊阁四库全书钞本,第8466页。

⑧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5《本纪第三十五·孝宗三》,第453页。

⑨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义仓》,第7564页。

⑩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赈贷一》,第7976页。

米斛仍常常面临捉襟见肘的尴尬。在生计艰难却又得不到相应的救助下,国家的编户齐民越来越多地沦落为流民、盗贼。

荒政的衰败和国家养民能力的下滑,是秉承“为生民立命”的理学家们难以接受的。当时,重申传统儒家道德的知识分子受到道家 and 佛教平等主义和慈悲向善教义的影响^①,力求在本心中固有的仁、义、礼、智等价值追求的坚守中寻道和“成圣”。于是,以魏掞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士绅在家国残破和民生多艰局势下,以“格物穷理”和“躬行实践”的自觉,创设了社仓这种新型的养民模式。

社仓是根据社会现实需要所创的社会互助制度,目的在于“根据春夏借出、秋冬纳还的原则,向需要借贷的乡民接济度荒的粮食”^②。社仓打破了灾荒赈贷的国家主导模式,并将救助性放贷下沉到乡村底层,理论上缝合了之前灾荒赈贷制度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供给和需求断裂问题,有助于乡村贫民在第一时间就地得到救助。

历代灾荒赈贷制度之所以难以实现既定的救荒目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非责以必偿”的内在要求。毕竟,普遍的偿还困难和蠲贷,既打击了国家持续组织赈贷的积极性,也导致赈贷资源无法实现有序循环。而社仓的设计和筹建者改变了赈贷的“秋成抵斗还官”传统,并充分吸取青苗法的失败教训,在不着眼于盈利的同时,赋予社仓取息的合理性。其中,朱子社仓明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的用途,即仓廩折阅和支吏斗等人饭米。《金华社仓规约》规定每户借贷时须纳钱五十文,“十五文给甲头,十文守仓人,十文杂支,十五文掌仓量钱”,同时收取耗谷三厘,“以备折阅及充每岁社仓杂费”。《清江县社仓规约》同样要求“遇收支日,日支饭米一斗”,以及“簿用纸札,每岁于息内支散”^③。另外,多收米谷着眼于社仓的持续运转,一旦“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数”,借贷利息就会取消,代之以“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即使放贷收取息米时,也会按照“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的原则,进行合理蠲免^④。正因为制度上明确了收取利息的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为了以息养仓,且利息支出项目和数量较为合理,从而规避了放贷取息可能遭遇的道义责难。

与国家主导的常平仓和义仓相比,社仓是开明官绅在较高的道义自觉和品行修养下创建的备荒赈灾制度,它不以国家威权为基础,而是以道义自觉为底色,因而具有显著的个体化或人格化特征。然而,较高的道义自觉和品德修养往往具有不可持续性,一旦某个特定的个体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意味着特定道义理念和行为的消散。

朱熹之后,社仓的运行日益遭遇着难以承受的运行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量收息米”的机制设计。宋末理学名士黄震坦言:“社仓元息二分,而官仓至取倍称之息,州县展转侵渔,而社仓无甌石之储。”^⑤正因为有较大的盈利空间,朱子社仓俨然成为一些人牟利的招牌,“名虽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虽文公,而其后不文公。倚美名而牟厚利者亦已不少”^⑥。于是,朱熹创办社仓之际努力赋予“量取息米”合理性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在不良官绅放贷盈利中被轻易摧毁。

四、备荒赈贷收息政策的反复

社仓的“量取息米”政策,深刻影响着明清时期赈贷制度的运行。明王朝建立后,先后通过杂糅收贮

① [法]程艾蓝:《中国思想史》,冬一、戎恒颖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14页。

② 陈支平:《朱熹的社仓设计及其流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③ [清]俞森:《社仓考》,李文海点校,清宣统三年文盛书局石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18页。

④ [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四十三《荒政·备荒总论》,第1266-1270页。

⑤ [明]叶盛:《水东日记》卷38《黄东发社仓记》,文渊阁四库全书钞本,第889页。

⑥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87《抚州金溪县李氏社仓记》,清安徽巡抚采进本,第7077页。

和令户部运钞采买预备粮储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于境内定为四所,于居民丛集之处置仓”^①的原则,在各县四周人口较为集中的集镇广设预备仓,并以此为基础重构了乡村救荒仓储网络。明太祖倡令筹建的预备仓是国家至上而下推行的官办民营备荒仓储制度,以实现“以预备仓粮贷民之贫者”^②的救荒目标。在预备仓创建之初,明廷就赋予了它“秋成抵斗还官”的放贷原则^③。永乐二年(1404),明廷以苏、松等地的水灾救助为契机,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借米则例》,并再次明确所借之米须“候秋成抵斗还官”^④。因此,预备仓赈贷从一开始就要求不收取利息。

预备仓设置在各县集镇虽更接近于乡村灾民,理论上更有助于提高救灾效率,但因远离官府的直接控制,仓廩失修、仓粮霉烂和仓粮流失等问题日渐凸显,一旦官府巡查,有司往往强制民户赔偿,加重了平民的负担。永乐六年(1408),明成祖听从臣下建议,决定将预备仓“移置仓廩于府州县城内”^⑤。预备仓远离乡村后,虽然为官府加强控制提供了便利,但也导致责任主体虚化,并为官府将仓粮挪作他用埋下了伏笔。宣德年间,预备仓“仓廩颓塌而不葺,粮米通负而不征”^⑥问题已经成为普遍的问题,名臣杨溥曾无奈言道:“今南方官仓储谷,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无存。皆乡之土豪大户,侵盗私用,却妄捏作死绝及逃亡人户借用,虚立簿籍,欺瞒官府。”^⑦鉴于此,正统五年(1440)明廷决定“遣官修备荒之政”,以整备预备仓为主线,对日益衰败的荒政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治理。在此过程中,地方上主动推出一些创新性举措,其中,福建布政司在赈贷时实施了“给借饥民,每米一石,候有收之年,折纳稻谷二石五斗还官”^⑧政策,并得到了朝廷的默许,开启了预备仓赈贷从“秋成抵斗还官”到“量取息米”的转变。

继福建首开预备仓赈贷收息后,一些官员陆续呼吁效仿朱子社仓和福建预备仓取息做法,将“量取息米”作为预备仓的常规政策。成化三年(1467),大学士商辂建议“今后各处预备仓,饥民关过米谷,不拘丰年中年,岁通取息一分”^⑨,在朝野中形成了较大影响。成化六年(1470),当大名、顺德、广平等地遭遇灾荒之际,大理寺左少卿宋旻建议:“选拣殷实大户、仗义乡官量与多寡,责令举贷,岁收其利三分,于预备仓上纳”^⑩。随后,汤阴县预备仓“每斛取二分之息”^⑪,清丰县请求预备仓放贷时“候秋成取息三分”^⑫,秦州预备仓放贷时“量借官粮为本,每石收息二斗”^⑬。

尽管“量取息米”着眼于预备仓的持续运转,而非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与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有本质的区别。但一些官员在坚持道义正当和遵从祖制的逻辑下,对预备仓“量取息米”政策进行了激烈批评。成化年间任礼部右侍郎的叶盛认为,商辂提出的预备仓赈贷“取息一分”建议,“既不合抵斗还官旧制,亦为不才官司添一骗局名目矣。”^⑭在咄咄的道义批判下,预备仓“量取息米”的策略失去了继续实施的舆论条件,到弘治年间不得不回缩到“秋成抵斗还官”的状态。

① [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八三《荒政部汇考十六》,中华书局,1934年,第683册,第25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249,洪武三十年正月乙亥,第3611页。

③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7《市采三》,第3040页。

④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17《灾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306页。

⑤ 《明太宗实录》卷80,永乐六年六月丁亥,第1068页。

⑥ 《明英宗实录》卷30,正统二年五月辛卯,第593页。

⑦ [明]杨溥:《预备仓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27《林贞肃公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199页。

⑧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22《仓庾二·预备仓》,第384页。

⑨ [明]商辂:《政务疏》,《御选明臣奏议》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⑩ 《明宪宗实录》卷86,成化六年十二月壬戌,第1666页。

⑪ [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4《设法劝借赈济例》,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46页。

⑫ 《明宪宗实录》卷119,成化九年八月癸酉,第2296页。

⑬ 《明宪宗实录》卷254,成化二十年七月辛亥,第4299页。

⑭ [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八《黄东发社仓记》,中华书局,1980年,第368页。

弘治以后,通过“量取息米”实现预备仓的持续运转已经成为禁忌。不过,随着预备仓的衰败和救灾能力的萎缩,具有浓厚民间救助色彩的社仓和义仓获得了发展空间。与官办的预备仓和官仓相比,社仓和义仓因有朱子社仓的道义庇护,在放贷收息之际遭遇的道义责难较为微弱。明孝宗时期,巡抚江西都御史林俊曾奏请劝社民立社仓,具体做法是“社中富民,任其出谷六百石或四百石别储一仓,极贫利一分,次贫利二分,春借秋还,转相赈助”^①。万历年间,秀水县义仓“每年于芒种时出放,十月征还,加息三分”^②。崇祯年间巡抚山西的蔡懋德,倡议修复的社仓要求“每于青黄不接时出贷,至冬收纳,量加息耗,一如朱子法”^③。民间创办的社仓和义仓收取放贷利息,在底层社会的救荒实践中获得了道义允许。

清王朝的荒政建设并未从官仓入手,而是借助于朱子社仓和民间义仓的外衣,对其进行改造后,逐渐铺设了集社仓、义仓为一体的乡村备荒仓储体系,承担向乡村贫民或灾民赈贷的责任。正因为此,它们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量取息米”的道义正当。康熙十八年(1679)户部题准设义仓和社仓,令“春月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④。雍正初年,清世宗采纳河南巡抚石文焯、山东巡抚陈世倌的条奏,要求各地设立的社仓在放贷之际,“每石将息二斗。遇小歉之年,减息一半;大歉,全免其息。十年后,息倍于本,只收加一之息”^⑤。

雍正后期,随着荒政建设的强化和仓储备荒能力的提升,赈贷之际的“量取息米”又开始向“秋成抵斗还官”游移。乾隆二年(1737)六月,清高宗要求各地常平仓和社仓在歉年出借时,“只应照数还仓,不应令其加息”,但有些省份以积累仓本为由,没有严格执行社仓免息政策。为此,清高宗又于次年诏令:“嗣后无论常平社仓谷石,若值歉收之岁,贫民借领者,秋后还仓一概免其加息……永著为例。”^⑥随后,社仓放贷免息在很多省份得以执行,其中,四川社仓“春借仓粮,无论丰歉,概不加息”^⑦;两广地区在救助南海、番禺、东莞等被雨灾民时,“借给贫民社仓谷石,秋后免息还仓”^⑧;福建对遭受旱灾的贫民“于社仓内借给麦本以资力作,俟来年秋收后免息还仓”^⑨。不过,一些省份继续收取社仓谷息,如广西各州县社仓出借之际,仍按照“丰收之年,秋后还仓,则照例收息”^⑩的办法运行。乾隆年间直隶总督那苏图劝捐的义仓,明确规定“每逢春借秋收,许愿借杂粮之户,按照粮价易谷交还,照谷数加息”^⑪。

赈贷收息政策有一个理论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就是受贷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内部差异和灾荒级别不一而诱发的迥异的偿还能力。对于实在无力偿还者,强制推行“量取息米”不仅不现实,而且缺乏道义合理性。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历代统治者采取了蠲免利息甚至蠲免全部债务的措施。蠲免赈贷债务早在先秦时期已经萌芽,到汉代已经实现“视时之丰歉、民之贫富而时有蠲贷之令”^⑫。明清时期,义仓和社仓赈贷收息后,蠲免利息同样成为变通举措。嘉靖年间任庐州府知府的龙诰,在所属各州县积极设置义仓,在赈贷之际“石取息一斗,小歉则蠲其息之半,大歉尽蠲之”^⑬。乾隆三年正(1738)月,清高宗同意山

①《明孝宗实录》卷202,弘治十六年八月庚子,第3752页。

②[明]李培修、黄洪宪等撰:《(万历)秀水县志》卷2《建制·仓廩·伏社乡义仓略》,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1)》,上海书店,1993年,第368页。

③[明]蔡懋德:《修复社仓议》,[明]俞森:《社仓考》,清宣统三年文盛书局石印本。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④《大清会典事例》卷193《户部·积储》,光绪本。

⑤《清实录》第7册《世宗实录(一)》卷26,雍正二年十一月戊申,中华书局,1986年,第400页。

⑥《清实录》第10册《高宗实录(二)》卷63,乾隆三年二月乙巳,第30页。

⑦《清实录》第9册《高宗实录(一)》卷51,乾隆二年九月是月,第875页。

⑧《清实录》第12册《高宗实录(四)》卷253,乾隆十年十一月乙酉,第271页。

⑨《清实录》第16册《高宗实录(八)》卷575,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壬寅,第315页。

⑩《清实录》第10册《高宗实录(二)》卷68,乾隆三年五月甲子,第101页。

⑪《清实录》第12册《高宗实录(四)》卷283,乾隆十二年正月是月,第694页。

⑫[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7《国用考五·蠲贷》,第786页。

⑬《明世宗实录》卷67,嘉靖五年八月丁卯,第1537页。

东布政使黄叔琳的奏请,对无力贫民赈贷常平等仓谷,“遵例免其加息,于秋成后催征收”^①。

清代中后期,随着内乱频仍和外患渐逼,国家救荒能力持续下滑,赖以备荒救灾的仓储体系在国家政治生态恶化、官僚体制迟钝和日常化的侵盗挪移下,越来越难以维系赈灾功能,清王朝在实施赈贷救荒之际越来越强调债务的偿还性,赈贷债务的蠲免更多地被缓征取代。据《清德宗实录》,光绪年间国家层面的赈贷仅有两例:光绪五年(1879)十月清廷决定蠲缓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三地歉收屯丁的额粮和借贷籽种^②;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赈贷呼兰、齐齐哈尔、墨尔根和布特哈灾民^③。此后,传统意义上的灾荒赈贷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制度土壤,并随着现代信用体系的构建,逐渐演进到新式农贷。

五、“抵斗还官”和“量取息米”的道义困局

灾荒赈贷自周文王实施“农假贷”以来,持续存在了近三千年,在中国荒政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救荒过程中,它与无偿的赈给和平价售卖的赈巢相互补充、有机衔接和各有侧重,为城乡灾民或贫民的生计提供了一种保障机制,尽管这个保障机制通常是脆弱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生产。”^④因此,相比于高利贷生息资本,着眼于乡村受灾的中下等贫民生计安全和农业再生产延续的赈贷,不能以商业化的取息盈利为目的,而是要按照“秋成抵斗还官”的原则偿还借贷。

在更深层意义上,赈贷“秋成抵斗还官”的偿还原则决定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治理文化和道德习俗。在“家国同构”的治理逻辑中,统治者对“子民”的生计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社会成员陷入生计危机之际,作为“君父”或“父母官”的统治者需要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习俗中,“为人君,止于仁”,仁和义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早在夏商时代,“恤万民”的仁义之举已经被看作为统治者必须担负的道义责任,后来儒家仁政思想和治国理念被广泛接受后,统治者“养民”的道义责任被进一步强化和放大。当然,社会成员并非整齐划一的,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统治者在救助之际,只需负责那些难以维持安全生计者,并采取差异化的救助策略。据此不难理解,通过赈巢救助城市中的贫民或灾民,对城乡赤贫者进行无偿的赈给,对乡村中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下等贫民或灾民进行赈贷,缘何能成为中国古代救荒的合理举措。

“家国同构”的治理文化和以仁义为主导的道德传统,与最大化商业利益的理念具有内在的矛盾,尤其是救助对象本身就已经被贴上因贫困而需要救助的道德标签后,对他们进行赈贷本身就缺乏取息盈利的道义正当,“秋成抵斗还官”也就成为偿还赈贷最能接受的策略。历代对高利贷的鞭挞和鄙夷,同样基于这一逻辑。

不过,赈贷是在灾荒之际秉持道义正当和有限财政压力的矛盾下做出的无奈选择。理论上,“秋成抵斗还官”的偿还机制能够确保赈贷的持续推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借贷者的贫困社会属性决定了拖欠和无力偿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此时如果强制要求偿还,不仅背离了救荒的初衷,也重新陷入新的道义责难。于是,在“非责以必偿”的普遍认知下,统治者不得不频繁通过蠲贷诏令,免除无力偿还者的债务。从前元二年(前178)汉文帝宣布赦免“贷种食未入、人未备者”的债务^⑤,到元和七年(812)二月唐宪宗决定放免上年春赈贷京畿百姓的24万石义仓粟^⑥;从皇祐四年(1052)三月宋仁宗昭告“蠲江南路民所

① 《清实录》第10册《高宗实录(二)》卷61,乾隆三年正月是月,第15页。

② 《清实录》第53册《德宗实录(一)》卷101,光绪五十月丙午,第512页。

③ 《清实录》第54册《德宗实录(二)》卷173,光绪九年十一月辛卯,第42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8页。

⑤ [汉]班固:《汉书》卷4《文帝纪》,中华书局,2000年,第85页。

⑥ [宋]王钦若编撰:《册府元龟》卷491《邦计部·蠲复三》,第5873页。

贷种数十万斛”^①，到乾隆时期“每遇偏灾，无不豫筹蠲贷”^②，无不表明“秋成抵斗还官”的难以为继。在此局面下，为了筹集赈贷资本和确保灾荒赈贷制度的持续运行，要么持续抽挤公共财政收入来填补，要么要求农民多缴赋税，要么开放权力市场以官位换取富民的捐纳。但前者遭遇着公共财政有限和优先满足政治、军事和行政开支的支出次序的约束，后两者面临着加重农民负担和“卖官鬻爵”的道义审判。

国营商业性信贷和政策性信贷的分离，曾为商业机制引入赈贷以解决“秋成抵斗还官”的困局提供了契机。早在汉唐时期，一些地方官府就曾进行过放贷收息的实验，但在特定的价值理念和道德习俗面前，它们根本无法大面积推广。为了破解国家财政短缺、备荒仓储运行效率低下和农民普遍的借贷困难，王安石从周代的泉府和新莽王朝推行的赊贷政策那里获得了赈贷收息的理论支持，并吸收李参和自己任职地方时推行“青苗钱”的成功经验，将收取二分赈贷利息提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但赈贷毕竟根植于国家与农民的道义关系，是国家履行“养民”道义责任的策略，通过青苗钱的放贷解决国家财政短缺，尤其是向乡村贫民收取市场化的信贷利息，甚至为了催收利息不惜加剧贫民的生计艰难，无论如何都缺乏道义正当性。

在青苗法失败后，宋代备荒仓储运行效率低下和贫困人群得不到有效救助等问题仍十分突出。南宋时期，朱熹等人在儒家伦理道德指导下，以实际行动践行“为生民立命”之举，开创性地创办了社仓，在南方乡村构建了贫民生计安全的新型保障机制。为了确保社仓的持续运行，朱熹等人吸取了历代官方备荒仓储和青苗法失败的教训，以合理的运行成本为由，赋予了社仓赈贷“量取息米”的道义合理性。朱熹本人的道义形象和社会影响，很大程度上阻挡住了人们对社仓“量取息米”的道义指责。但遗憾的是，后来社仓的创办者在道义自觉和道德自律方面并未能与朱熹整齐划一，一些人打着朱子社仓的旗号行高利贷剥削之实，使社仓放贷取息不断遭遇着道义危机。明代创办的专门用以赈贷救荒的预备仓，始终不敢大张旗鼓地收取放贷利息。

在有限财政的压力下，国家赈贷供给和贫民对救助性信贷的旺盛需求之间的矛盾持续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子社仓“量取息米”的道义合理一再被强调，进而诱导了明代中后期地方举办的社仓放贷取息倾向。清王朝建立后再次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国家威权对社仓和义仓进行改造后，明确了它们“量取息米”的合法性。不过，清王朝的统治者十分清楚，赈贷收息只能限于以息养仓，而不能效仿青苗法去解决国家财政短缺的问题。于是，在强大的专制政权、朱子社仓的道义形象、宋明理学的衰落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向等多重因素下，清王朝推行的备荒仓储赈贷收息政策遭遇的道义责难极为微弱。然而，贫民获得赈贷后无力偿还毕竟是客观事实，“量取息米”和“以息养仓”的策略并不能强硬地施用。为此，在推行赈贷收息政策的同时，又针对不同的灾情和灾民群体，频繁推行蠲息、蠲贷、缓征等措施。

尽管实施了蠲息或蠲贷政策，但备荒仓储赈贷收息毕竟具有制度上的保障，在信息传递迟滞、官吏利己动机和仓储备荒储备水平作为重要考课指标下，赈贷的“量取息米”偿还政策又陷入了另一个道义陷阱：为官吏以合法暴力为工具，强制追还债务和加收利息提供了便利。万历年间，御史马象乾等指出：“朝廷一面蠲贷，有司且奉文以催征。”^③乾隆年间的荒政学家万维翰言道：在组织赈贷之际，“必有胥役之需索、保领之克扣、完纳之浮收、地棍衙蠹之冒捏”^④。道光年间的御史奏报称：“州县官于民间青黄不接之时，借给籽种，至秋取偿数倍。幕友胥吏，均各分肥。”^⑤这些行为，显然背离了“抵斗还官”或者“量取息米”的初衷。

（下转第71页）

① [元]脱脱：《宋史》卷12《仁宗四》，第155页。

② 《清实录》第18册《高宗实录（十）》卷1376，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己酉，第473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124，万历十年五月甲子，第2309页。

④ [汉]万维翰：《荒政瑣言·出借》，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65页。

⑤ 《清实录》第33册《宣宗实录（一）》卷28，道光二年正月戊午，第504页。